

方法的;既有老一辈学者的力作,又有年轻学人的佳篇。涵盖全面,扎扎实实,精彩纷呈。

我本人是《文献》的忠实读者,从中获益匪浅;我本人也有幸在《文献》上发表了一些拙文,有机会得到切磋和交流,深怀诚挚的谢意。

回顾往事,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历程,都在《文献》上留下痕迹。记得我发表在《文献》上的第一篇论文是《〈史记〉采用文献史料的特点》,具体期号是1980年第2辑,总第4辑。此文后来又载入拙著《中国古文献学史》,成为第二章《司马迁》一节的内容。我发表在《文献》上时间最近的论文是《定州汉墓竹简〈论语〉校勘指瑕》,具体期号是2007年第二期。此文是本人在编纂《儒藏》中的附带研究成果。中间还陆续发表过《古代校勘学概述》(总第8、9辑连载,1981年)、《古代辨伪学概述》(第14、15、16辑连载,1983年)、《高适集版本考》(第11辑,1982年)、《高适集校敦煌残卷记》(第17辑,1984年)、《汉代的经今古文学》(1985年第2期)、《汉代的纬学和纬书》(1985年第4期)、《刘知几在古文献学上的成就》(1988年第4期)等。在《文献》创办的30年中,能有如此机缘,自己深深感到值得庆幸和珍惜。

《文献》是一个很有专业特色的刊物,作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,已经在学术上发挥了巨大作用。我衷心希望《文献》越办越好,永远是繁荣学术的一片沃土。

三十功名话一刊

——纪念《文献》季刊三十华诞

国家图书馆 李致忠

1977年1月,为总结交流图书馆工作经验,促进北京图书馆在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科学研究,本馆试办了《北图通讯》内部刊物。至1978年底的试办期间,刊物不但促进了北图的业务和科研进步,也深受国内图书馆界的认同和欢迎,上千个单位致函北京图书馆,要求正式发行,以便订阅。1978年4月,北京图书馆向上级主管单位文化部文物局呈递了请示报告,申请自1979年起将《北图通讯》正式出版发行。报告还同时申请自1979年试办《文献导报》,这就是《文献》季刊的滥觞。

《文献导报》确定为季刊,所要刊载的内容是对本馆及其他收藏单位所藏国内外有价值的哲学、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献研究、评介以及文献工作的动态等。发行范围是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单位。经上级批准,《文献导

报》在1979年试办了两期。试办筹备过程中,我记得策划人之一的陆宏基找过我,意在听听我的意见。记得当时谈话的内容涉及几个方面:一是要将重点放在揭示馆藏上,深化为读者服务;二是作者队伍要注意本馆人,以便培养自己的人才;三是创刊之后的前若干期要约一些大家撰稿,以便撑起刚刚起航的风帆;四是要刊载干货、实货,力戒空谈;五是多发掘有价值的文献,不登或少登理论文章。我和陆宏基是同事、同志、校友,谈话比较随便。三十年过去了,回顾起来仍记忆如昨。

1979年12月,以《文献》丛刊的名义正式发行。先是丁志刚副馆长任主编,后由胡沙副馆长任主编。杨殿珣、李希泌、刘宣、陈翔华、毛华轩等好像都是编委,实际也由他们这几人来办刊。我也经常列坐其中,跟他们一道讨论办刊和文稿事宜。1985年,《文献》丛刊改称季刊,那时印厂吃紧,很多刊物不能按时出刊,《文献》也一样,读者开始有意见。1987年经过整顿,提高了编辑质量和水平,脱期现象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,订户大大增加,进入了最红火的时期,发行量最多时每期能达到8000份。1995年5月,《文献》季刊编辑部更名《文献》杂志编辑部,隶属于本馆出版社,由出版社总编辑或副总编辑出任主编。2000年,国家图书馆成立发展研究院,经馆长办公会研究决定,成立期刊编辑部,将《国家图书馆学刊》和《文献》季刊都隶属于研究院。研究院接手后,对两个刊物明确提出要求,要求两个刊物一定要把好三关:即把好政治关、学术关和文字关,审稿时要特别注意政治错误和副作用,然后才是学术质量和学术水准,最后才是文字表达能力。期刊编辑部这么做了,刊物也就成功了。现在这两个刊物都是核心期刊,《文献》季刊更具功名,影响更大一些。

依我个人的看法,三十年来《文献》季刊坚持了实、稳、正的办刊风格。所谓实,即所发表的文章多为干货、新货、实货,不空论、泛论,文风也朴实无华,大家多感觉这个刊物办得很实。所谓稳,刊物办得不张扬,不漂浮,求稳妥,不轻易发表批驳别人的文章,不轻易发表标新立异的文章,特别注意民族宗教及其他政治敏感问题,始终稳中求进。所谓正,即始终坚持不收版面费,不刊载质量低下的人情稿,只看文稿水准,不看名头大小,在学风上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,引领正确的方向。它之所以为学界、高校很看重,取得了一定功名,大概也就缘自这些。我衷心祝愿《文献》季刊越办越好。